

一九八二年年会论文集

湖北省中国史学会

目 录

毛泽东同志的史学思想……………皮明森 (1)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起源史研究……………李 建 (25)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认真研究大革命时
期湖北和武汉工人运动……………曾宪林 (47)

从认识论看历史人物评价……………邓鸿光 (71)

史料·考证·史学……………黄惠贤 (86)

继承祖国历史遗产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夏被民 (94)

略论我国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
——关于史学遗产批判继承的点滴体会
……………卢开万 (105)

孟子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古代精神文明
……………钱远珞 (121)

目 录

试论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冯天瑜 周积明 (138)

章学诚史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匡裕彻 (155)

试论孙中山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朱秀武 (168)

坚持民族利益 不惧强暴威胁……………马天增 (184)

试论康熙统一台湾成功的原因及成就……………李家桂 (200)

林则徐在两湖的政绩……………肖致治 (217)

试论洋务派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王承仁 (241)

清末湖北拒款保路斗争述略……………吴剑杰 (261)

论湖北军政府初期的财政基础及财政措施

……………李天松 陈桢琰 (283)

试论恩施地区的土家族……………赖家刚 (304)

附:

湖北省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毛泽东同志的史学思想

皮 明 麻

从“五四”时期开始萌芽，经过长期艰难的开拓，发展到今天这样宏阔规模和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和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史学思想上的指导分不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在寥寂隔世的书斋中孕育出的经院之学，而是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相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科学研究才形成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学科。当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学原理的传播和阐释。作为党的主要创建人之李大的李达，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理论上）的奠基人。参加党的缔造，而且在半个多世纪来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来在全党确立起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抗战以来，这种贡献尤为显著。在积年征战、日理万机的战争岁月中，毛主席如此垂意于史学，这是了不起的。毛泽东丰富、精湛的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垂法史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史学的重要性的目的论

毛泽东同志对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地

位，给予充分的估计，并且把这种作用提高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必备条件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我们的国家有着古老的文明，也有古老的史学。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①对于祖国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起就潜心探习。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总离不开读史，他反复教导干部学习历史，不仅学中国史，而且要学点世界史。他批评有些干部“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三卷，第798页）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怎能数典忘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两眼漆黑呢？毛泽东深同志深觉察到我们不少干部和党员在历史知识上的贫困状况，觉察到我们国家在历史研究中的落后状况。还是在抗战时期，就尖锐指出：“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中国的古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第二卷第797页）

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和研究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同志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卷第521页）干部学习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历史知识丰富思想，发展智能，

也不仅以古镜为鉴，通过探寻历史上的兴衰治乱，总结经验教训；而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如果不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而侈谈马克思主义，势必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使之教条化。而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是导至革命受挫或失败的主观原因。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攸关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卷第801页）这里，毛泽东同志告知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结合，其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为中国的今天是以中国的昨天、前天发展而来的，只有溯源昨天、前天，才能深刻理解今天。我们从事革命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而射准这个‘的’，只有对中国的今天、昨天、前天，即中国的国情，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可能的。能否‘矢’发而‘的’中，不是靠夸夸其谈，不是单凭书本，不是凭一时热情，而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认真把握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要从国内外、省内外、

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第二卷第801页）对于中国现状和历史认识得越深刻，则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将更正确。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正是借助于认真研究现状、学习历史这一必不可分的条件的。

回顾一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学战线上的论战，对我们加深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党和人民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当时诸说纷纭，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者有之；认为二十年以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者有之；认为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者有之。要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作出马克思主义回答，就必须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论断；而要论定“今天”的中国社会性质，又牵动了对中国社会“昨天”和“前天”的探讨。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清中国社会之所自，就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引出科学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革命实践的需要成为这场史学，主要是历史哲学论战的动因，而论战的理论成果，恰恰是为了从社会性质中去求得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对象以及前途等问题的科学规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风雨如晦”之时，依靠党的领导，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努力利用中国古史的资料，包括其以攻坚的姿态在甲骨文、金文考释方面所取得的远逾前人的成果，担负起了论述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必然性的使命。郭沫若在一九二八年就把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周易的时代背

景与精神生产》，驱走了《周易》的神秘幽光，剔开了书中所记我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活。一九二八年，他又写了《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等文证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遍真理性，驳倒于陶希圣、李季以及陈独秀等人所鼓吹的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例外论”。一九三〇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划时代的界标式的著作，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系统阐述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它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而涌现出来的史学硕果。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在当时，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其目的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真理性，导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郭沫若等人的贡献就在于一扫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成见的圈子”，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为我们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历史论证。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他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时，也吸收了的这次论战的理论成果。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几个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而成。这一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

点，进行了简赅而又深刻的论述，及时地总结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集中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也吸收了包括史学家在内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及前途诸问题。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科学的史学研究决不是躲在古史的暗堡中去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遵命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地阐明祖国的历史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历史的纵深中提供依据。正是洞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毛泽东同志谆谆教育大家：“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第二卷第 522 页）

从上面毛泽东同志对学习历史重要性的论述中，也就表明了他所倡导的研究历史的目的论。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单纯地为猎取知识而历史，而是为了科学地认识祖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古为今用”，鲜明地概括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指明了为革命事业需要而研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只要我们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这个口号，就能有机地把历史这一学科和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并使前者服务于后者。而这样做，将使我们的史学和效命于帝王将相的封建史学划清界线，也跳出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迷宫。

但是，对这一口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存在“左”的曲解。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在这个口号下偷运实用主义的私货。他们以古代今，以古射今，演化出荒谬绝伦的影射史学。他们的方法论是“学一点、用一点”，每论及一个古人、一件古事，都要达到直接的现实应用目的。甚至不惜以“七真三假”的手段，通过伪造或歪曲史实来贯彻现实的反革命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为今用”原则本身的弊病，只是暴露了林彪，“四人帮”偷梁换柱的反革命伎俩而已。

毛泽东同志对于研习历史如何达到“今用”，有许多科学而又精辟的见解，堪为治史者矜式：

第一，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引导人们向前看。人类社会运动不息，革命事业奔腾向前。人类就是在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中取得自由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会完结。”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认识运动也就存在。“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历史，自觉地认识历史规律，做历史发展的促进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第二卷第701页）对于古代历

史的探讨，决不是要把读史者引到时代的后院中，一辈子与世隔绝地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陶醉在唐虞三代的象牙古塔之中，而对现实的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的振兴却漠不关心。恰恰相反，即便我们一辈子从事古代历史的研究，也仍然是为以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服务于现实，在当前就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四化而效力。这样的学习研究历史，不仅不会贬低或窒息史学，而且会给它赋予无穷的活力，给它以发挥作用的广阔场所。

第二，通过治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于中国古老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勤劳而又勇敢的革命传统，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革命领袖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对于无数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历史遗产，给以充分的肯定，热情的讴歌。他鄙薄那些“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批驳“中国毫无出路”的悲观主义论调。由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稔之弥深，因此爱之弥切，而民族自尊之心也弥坚。他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第四卷第1516页）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毛泽东同志把那些爱国主义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为振奋中华做出了贡献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充满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陈胜吴广，亦或是与外国侵略者及中国反动派作斗争的林则徐、孙中山，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歌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缅怀“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号召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因为“他们表现了

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第四卷第1499—1500页）

第三，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时，十分注意借鉴历史经验，包括党自身的历史经验，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研究党内历史经验的态度和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三卷第942页）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以延安整风为基础，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其目的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第二卷第958页）为了克服和防止党内骄傲情绪，毛泽东同志除教育大家从党史上陈独秀、王明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外，还号召大家学习郭沫若为总结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经验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第三卷第952页）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引证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并以此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当受到委屈和“下降”时，能在逆境中锻炼革命意

志。同时他又指出，作为党的组织，决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对人作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臬的膝盖骨那样。”③一经发现处理错了，就要甄别、平反。毛泽东同志在教育领导干部要讲民主，要联系群众时，很风趣地以霸王别姬的故事为训。他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从谏如流”，项羽搞孤家寡人政策，“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落一个“别姬”的结局。他由此引申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④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善于以古为镜，从历史事件的正反面吸取经验的宝贵范例。由于毛泽东同志文史根底深，对史事信手拈来，从中发挥引申，会通古今，使闻者如坐春风，神开思化，受到教益。

二、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史学方法论，并且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或提出新的命题。

如所周道，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根本方法论的。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阐述和发展，对我国史学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第四卷第1519页）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社会形态、社会思想文化等所作的深刻论述，散见于他

的各种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中，毛泽东同志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论原理来指导史学研究，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史学。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第一卷第292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就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运用新的宇宙观和历史考察社会，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其中包括“在历史学方面”，“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第二卷第690页）

反之，毛泽东同志对统治史坛几千年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面作了深刻的批判，以期驱散它对于史学的桎梏。旧的史学由于受唯心史观的主宰，加上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足，不能不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颠倒。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第一卷第272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社会历史的认识变成科学。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旧史学来看，《春秋》、《左传》不谓不古老精核，二十四

史不谓不规模恢宏,《资治通鉴》不谓不体大思深,在记叙事实、考析史料等方面以及某些历史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其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些都不意味着史学已经成为真正的科学。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也不能不承认《资治通鉴》的封建性,指出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⑤史学之成为科学必须借助于历史唯物论的指导,而历史唯物论一旦和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则导致了历史学的划时代的飞跃,导致了历史学本身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揭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如何走向科学,揭示史学自身的历史辩证法,其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坚持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只要人们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第三卷第816页)才会有真正的历史科学。

毛泽东同志不仅对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本文不一一阐述)及其对史学的重要性反复进行论述,而且对如何运用历史唯物论治理史学指明了途径。这后一方面有许多宝贵的思想。

第一、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只能记叙和论述,而不能任意雕饰,滥施斧柯。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第三卷第800页)在这里,占有材料是基础,是研究的出发点。决不能乱逞己意去“命令”史实,让史料去服从史家的所谓史意。他强调说:“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卷第 801 页) 这种大量占有史料, 从史料中引出具体结论的方法, 是把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运用于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表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而只有尊重事实, 才能真正尊重真理。沿着这种方法, 人们才可能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建立科学的史学。

为了占有材料, 毛泽东同志认为除了征引书本资料外, 还要做社会调查, 以收集现实的和历史的材料。毛泽东同志本人早期在湖南和江西就做过许多有名的农村调查, 向群众、中下级干部、穷秀才、商会会长、小官吏等学习, 从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种方法, 不仅对党的工作者从事革命工作行之有效, 就是对治史也很有必要。我国自解放以来, 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调查、民族史调查、文物普查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会党等各种专题调查, 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在史学方面的运用, 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 而且是以往书本上不见载录的。

第二,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历史。材料是治史的基础, 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学。自有阶级以来,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现象(除语言、逻辑等外)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观察社会历史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即阶级分析的方法, 作几次周密的调查, 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第三卷第 789 页) 研究历史不是罗列材料, 铺陈现象, 而要对历史作出本质的说明。对社会历史作出本质的说明, 就要借助阶级分析。如果不进行阶级分析, 历史现象将只是一团乱麻。

对于社会历史现象作阶级分析, 将使人们看清正反、新

旧、美丑、是非，引导人们站在新兴的阶级一边，歌颂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人物和事物。毛泽东同志对于历代农民领袖、民族英雄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艺家的肯定，都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从他们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中得出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春写过一首《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如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跻流鉴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⑥词中纵观古今，上半阙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勾出了一个简明的轮廓，下半阙揭穿了统治阶级宣传帝王圣明以愚弄百姓的骗局，而对于代表下层劳动人民，敢于振臂“挥黄钺”反抗统治者的跖、庄跻、陈胜却寄以崇爱之情，论为风流人物。词中贯穿阶级分析，爱憎分明，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第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全面地、发展地观察历史。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时，还坚持历史主义。毛泽东同志鲜明地表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第二卷第522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从历史的具体时间，条件出发，在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地、发展地观察历史，对具体历史问题作具体分析。不仅看到历史事物本身，而且看到它的社会背景；不仅看到事物的今天，还要看到它的昨天，前天，不仅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看到它的反面，不仅看到事